

论 20 世纪二三十年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

周春英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作家, 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 关注妇女命运, 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形象, 重视她们所受的阶级压迫, 很少关注这些女性内心自主反抗意识的萌动。其实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压迫者, 她们也有一些主动的反抗意识和行为。文章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些意识和行为进行剖析。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2) 03 - 0018 - 05

从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明清开始, 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著书立说, 反对男权意识、倡导提高女性地位。1791 年, 法国的奥普林·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 英国的玛丽·奥尔斯通克拉夫发表了《为女权辩护》等著名论文, 阐述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缺席的现象, 批判女人人生来是男人附属物的观点。中国明代的李贽宣扬“童心说”; 晚清的梁启超、秋瑾、金天翮等积极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金天翮 1903 年出版的专著《女界钟》, 系统地论述了妇女的权益问题, 呼唤妇女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大力倡导妇女人权”, 提出“妇女也是人”等观点。李大钊写了著名的《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文章, 提出: “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 Democracy, 必须要求妇女解放。”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 强烈抨击了封建社会统治者把“国将不国”、“人心日下”的现状归咎于妇女“不节烈”的观点。

鲁迅不但在理论上大声疾呼, 而且把这种思想贯穿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 在小说《祝福》《明天》《离婚》《伤逝》中, 通过塑造三种不同命运的女性形象, 呼唤女性的觉醒, 探讨女性的出路。鲁迅的小说, 在一批远离家乡去城市寻求

发展的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影响, 他们也像鲁迅一样, 通过塑造女性形象, 探讨女性的命运和前途, 如: 许钦文《疯妇》; 台静农《烛焰》《拜堂》; 彭家煌《怂恿》; 许杰《放田水》; 王鲁彦《李妈》《屋檐下》《愤怒的乡村》等。

对于这些女性形象, 学界多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她们的命运, 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她们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比较欠缺。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 通过归类比较, 探讨她们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 揭示其女性意识由完全麻木到逐渐觉醒的过程。

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有多种解释, 乐黛云认为: “所谓女性意识应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是社会层面, 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 第二是自然层面, 从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 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 第三是文化层面, 以男性为参照, 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创造的‘边缘文化’, 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叙事方法。”根据这个观点, 可以发现以鲁迅为首的乡土作家基本上是从女性意识的第一个层面, 即从社会阶级结构展示女性受到

收稿日期: 2011 - 04 - 14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 (Y200804940)。

作者简介: 周春英 (1962-), 女, 浙江诸暨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 zhouchunying330@163.com

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意识的觉醒来塑造女性形象、思考女性命运的。他们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第一类是在封建社会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失去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受教育权利，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无法掌握自身命运，基本丧失女性反抗意识的女奴。如鲁迅《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妻；台静农《烛焰》中的翠姑；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吉顺妻。第二类是反抗意识刚刚有所萌芽就被外在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压制的女性，如鲁迅《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废名《浣衣母》中的李妈。第三类是反抗意识开始觉醒的女性，如许杰《放田水》中的阿元嫂；台静农《拜堂》中的汪大嫂；王鲁彦《李妈》中的李妈、《屋顶下》的阿芝婶、《愤怒的乡村》中的葛生嫂等。

鲁迅《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基本没有反抗意识的女奴，属第一类。鲁迅把这两个女性都设置成寡妇，而且都要面对严苛的生活环境。单四嫂子独自带着三岁的儿子，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必须纺纱到深夜，红鼻子老拱们不但不帮助她，还常常拿她过嘴瘾。当她儿子生病时，蓝皮阿五乘机“吃她的豆腐”，周边的人都充当冷漠无情的看客。她一个人抱着儿子去求医，眼睁睁的看着儿子死亡，独自经受失去儿子之后痛彻心扉的哀伤。单四嫂子除了悲伤、绝望和接受现实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反抗的行动，哪怕在内心产生一丝念头都没有，单四嫂子已经完全被外在封建社会压制成木头一样的女奴了。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四老爷家时，丈夫也死了。祥林嫂是因为怕被婆婆卖掉而逃出来打工的。在鲁四老爷家的活计并不轻松，但毕竟没有被卖掉的担忧，所以她的脸色反而好看起来了。不过最终还是逃不出婆婆的魔掌，被卖到贺家坳，即使拼死挣扎、甚至撞破脑壳也无法改变被卖的命运。幸亏贺老六心地善良，两人之间有了几年短暂平静的生活。但灾难接踵而至，先是贺老六得伤寒病不治而死，后是三岁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祥林嫂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回到阶级压迫的状态中，这时的祥林嫂已经背着“克夫命”、“白虎星”的罪名，民众（包括鲁四老爷、鲁四婶）除了对她进行肉体上的压榨以外，更多

了一层精神上的排挤。两个死去的丈夫成为祥林嫂心理上沉重的负担，最后，祥林嫂活活的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座大山压疯、压死。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两个丈夫早逝的女性，她们身上的性别之争被严苛的生活之争、残酷的社会之争所代替。不过与单四嫂子相比，祥林嫂进步一些，当她得知婆婆要把她卖掉时，她会从家里逃出来，当被婆婆抓住卖到贺家坳去时，她会大哭大闹加以反抗。但是与其他先进的妇女比较起来，祥林嫂的反抗意识还是不够强的。这表现在她对人们一直用第一个丈夫的名字称呼她丝毫没有异议；另外，祥林嫂对于丈夫的依赖性很强。

鲁迅塑造这两个人物意在批判社会的黑暗、周围人们的冷漠自私；同时对单四嫂子、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她们缺乏强烈的反抗意识表示不满。

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妻，十分勤劳，她每天工作14小时，一天要褙一千八百张锡箔。她与丈夫相处和谐，也很孝敬婆婆，但双喜娘不喜欢她，因为她没有继承双喜娘经布的技巧，又夺去了双喜的爱。所以，当双喜妻因为送丈夫多走了几步，导致鬃头被猫叼去，去追猫的过程中淘米箩又被河水冲走之后，婆婆不但没有原谅她，反而跑到别人家里去宣传她的不好。在这个单亲家庭中，婆婆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家长，她的一言一行直接对双喜妻的生活构成威胁。双喜妻对婆婆的做法很不满，但卑贱的地位、内向的性格，使她不敢发泄，只有把冤屈闷在心里。结果，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疯了，三个星期之后就死掉了。一个健康能干的妇女就这样被怨毒的婆婆和自己懦弱、缺少反抗精神的性格夺去了生命。台静农《烛焰》中的翠姑也是如此，未来的丈夫病重，夫家要她去“冲喜”，母亲阻止，父亲从传统的习俗出发，认为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同意翠姑出嫁，而翠姑自己缺乏主见和反抗性，结果匆忙出嫁。三天后就穿起孝服，为丈夫送葬，留给给她的是终生守寡的悲哀。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吉顺媳妇也是一个夫权制下的牺牲品，丈夫为了还赌债，把她当作一个抵押品典给举人，去为他生儿子。当吉顺媳妇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也掠过一丝反抗的意识，但最终还是顺

从了丈夫的安排。彭家煌《怂恿》中的政屏,受牛七的挑拨,为了要挟裕丰,指使自己的妻子二娘子跑到原拔家去上吊,尽管二娘子得知后这个消息后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但还是顺从丈夫的旨意去了,吊在原拔家下人盛大汉的床弯里。被原拔家救下来之后,被小通州和盛大汉一个吮嘴唇、一个吹屁股眼的下流方式进行抢救,受尽了侮辱,差一点成为家族间争斗的牺牲品。这类女性基本上失去抗争意识,任人摆布,其命运可想而知。

第二类女性是稍有反抗意识和行动即遭扼杀。鲁迅《离婚》中的爱姑,因为丈夫觅上小寡妇、公公也帮着儿子一起欺负她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爱姑带着自己的六位兄弟、父亲,一次次去夫家争吵,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将近三年,但最终被七老爷的威严和一声响亮“来……兮”吓得改变了主意,由原来的坚决不肯离婚、不肯接受调解变为愿意接受“七大人的吩咐”而离婚。爱姑的反抗意识和行动完全是被外在强大的封建势力所扼杀的。

《伤逝》里的子君与前面几位女性相比反抗意识更强。当她爱上涓生之后,遭到父亲和叔叔的反对,她公开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勇敢的冲出家庭,与涓生走到一起,共筑爱巢。但是同居后不久,炙热的感情开始冷却,勇敢的子君开始被一些琐碎的家务所缠绕,不是为油鸡与女房东斗气,就是被家务事搞得蓬头垢面、心情很差,结果弄得涓生的心情也不好,两人之间的感情日渐淡薄。在这个节骨眼上,涓生的上司知道了他们夫妻间闹矛盾的事,辞了涓生的工作。经济来源被切断,新的谋生之道一时又找不到,两人的生活开始受到威胁,美丽的爱情开始褪色。而子君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终于使心灰意冷的涓生说出了分手的话。不久,子君的父亲把她接回去,不出几个月,孤独伤心的子君悲凄地离开了人世。子君情感的失败和她的死表面上看起来是涓生的冷酷无情导致的,实际上真正的杀手是残酷的现实社会给这对年轻人精神上、物质上带来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呼吸困难、步履维艰。当然也跟子君同居后陷于琐碎的家务而折断奋斗的翅膀有关。鲁迅创作这部小说意在强调自己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观点:“所以为娜拉

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废名《浣衣母》中的李妈早年丧夫,一个人拉扯大一群孩子,她对周围邻居甚至过路的人都很慈爱,因此大家称她“公共母亲”。原以为养儿可以防老,可孩子们长大后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希望破灭了。这时来了一个中年汉子,在李妈家门口搭了一个茶铺,李妈产生与他一起度过余生的念头。可是周围人的态度马上变了,流言蜚语也多起来了,“公共母亲”变成了“城外的大老虎”。她原先付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良好信誉,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面前化为唾沫。最后,那个汉子走了,李妈的生活恢复原样,周边的一切也重归平静。李妈一个人的力量无法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匹敌,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些女性都是这个社会中最不幸的人物,她们生活范围狭窄,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也有反抗意识的萌生,但强大的封建势力,根本不给这些反抗的幼芽生存的机会。

但是在乡土小说中,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逆来忍受的,也有几个女性形象的反抗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尽管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2]鲁迅也深知中国妇女争取应有权力的艰难,在1919年就提出女性离家出走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家,此外别无出路。

但是,时代毕竟已经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引入,尤其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一剧在国内的上演,使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新观念,女性内心的自主意识逐渐萌生,她们开始寻求自我解放之路。乡土小说家自然也受这样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

许杰《放田水》中的阿元嫂是一位坚强、不

为恶势力所屈服的女性。在丈夫被地主打伤后，她怀着“要活下去”的强烈信念，承担起去农田看水的任务。当她半夜扛着锄头去田间看水时，路上即遭到男性的调戏和地主儿子的威胁，但这些都没有压倒她。“有钱有势的人，固然可以做人，但是我们穷人，难道应当饿死吗？不，不，我也应该挣扎，挣扎着做人。”这是阿元嫂生活的信念，也是支撑她行动的力量所在。她这种生活的勇气彰显了女性反抗意识开始萌芽的曙光。

台静农《拜堂》中的汪大嫂有着纯朴和善良的美德，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丈夫死后，小叔子汪二爱上了她，这在当地人看起来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而且汪大嫂已经怀孕。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甚至连公公也决绝的反对他们结合。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把婚礼安排在后半夜，但汪大嫂考虑到今后还要在这里生存，就坚持请邻居田大娘作为婚礼的主持人，按照正常结婚的仪式举行了婚礼。汪大嫂身上体现出一种光明磊落，行得正、坐得稳的为人做事风格。

王鲁彦《李妈》中的李妈，因为丈夫被拉丁，家乡又遭灾，被逼无奈到上海去寻生计。刚开始当女佣时，李妈处处小心，非常勤快，但不是被主人辱骂，就是被拳打脚踢。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要受到雇主这样的欺压？要不是乡下九岁的儿子病着、饿着，她绝对不会受这种气。渐渐地，她内心的反抗意识开始萌芽，她也像其他娘姨一样开始怠工、偷懒，主人稍有意见，她就发脾气，比主人还凶，有时揩了油被主人查出来了，她也不害怕，不脸红，对于主人的小孩，她不肯再被他们踢打，而是进行反抗。被主人辞退后，她又神气十足地坐在荐头行的门口，摆出一副“老上海”的派头。虽然许多研究者认为李妈的反抗有点变态，人格变得低下，但范伯群和曾华鹏在专著《王鲁彦论》中对李妈的行为是肯定的，笔者也认为对付那些不体恤下人的雇主，反抗是必须的。李妈的反抗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她的反抗手段是不可取的。其实李妈由一个诚实善良的乡下妇女转变成为一个刁钻油滑、具有变态反抗意识的娘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雇主恶劣言行的逼迫以及其他娘姨的教唆所致，实际上还是当

时社会的黑暗所致，统治者的残酷、社会道德的沦丧、老百姓生存的艰难、一些小人物像荐头行老板的无行，都是造成李妈变态反抗的原因。

《屋顶下》叙写了婆媳之间因为生活理念的不同，为一些生活小事产生矛盾的过程。媳妇依照丈夫的吩咐，买来了新鲜黄鱼和新上市的蔬菜孝敬因过度操劳而身带疾病的婆婆，婆婆却因为心疼钱而不肯下筷；媳妇以为这些食品不合婆婆口味，又去买了红枣等补品，婆婆不但不领媳妇的情，反而生气而且出口骂人。阿芝婶忍耐几次之后就开始了还击：“不吃你的饭！一样是人，都应该管管自己！”由争吵到各自离家。丈夫出面劝解，阿芝婶也不让步，“你的钱，统统给她寄去！我管我的……一年两年后，我租了房子，接你来！十年廿年后，我对着这大门造一所大屋给你们看！”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婆婆作为封建家长，对媳妇握有生杀大权。尽管有好多女性，自己也是受了好多苦才熬成婆的，但一旦她成为婆婆，就对媳妇百般虐待和挑剔。历史上因为婆婆不能容忍媳妇，导致媳妇或被休、或被整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陆游第一个妻子唐婉，都是因为婆婆不满被休回家，结果兰芝被兄弟逼迫投水而死，唐婉抑郁生病而死。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因为12岁的年纪看上去有14岁高，不怕羞，吃饭吃三碗这样一些正常的举动，结果被婆婆以做规矩为由，连续毒打一个多月，用烙铁烙脚心，用开水烫，直至被整死为止。可见，在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家长的婆婆对媳妇的压制，也是封建势力对妇女的一种迫害。

王鲁彦的家乡宁波是五口通商最早的口岸之一，资本主义文明进来的比较早，这里的人拜金主义的思想比较重，但相对内地来说比较开放，女性出去挣钱养活自己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王鲁彦在《屋顶下》塑造的阿芝婶是这方面的代表，她不再像《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妻子兰芝那样无奈地听任婆婆的驱逐，也不像许钦文《疯妇》的双喜妻被婆婆无言的责备夺去生命。而是离家进城去打工，与丈夫携手寻求幸福之路，体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个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在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中,葛生嫂这个形象迄今为止研究者很少,其实这是一个充满反抗精神,没有妥协、不肯屈膝、性格刚烈,对亲人很关心体贴,对反动阶级嫉恶如仇的女性。葛生嫂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当阿如老板与华生因为轧米事件发生冲突之后,华生被乡长派来的人带走了。葛生很害怕,葛生嫂就大声责备葛生:“你怎么呀……你怎么让华生给保卫队捉去呀!……你这没用的人!”葛生从乡长那里回来之后,夫妻俩人的对话也颇能显示出不同的个性:葛生想的是怎样把这件事平安了结,而葛生嫂敢于大声抗议,支持华生,不畏惧阿如老板的权势。“我们能够不到埠头去吗?不到桥西去吗?不在他的店门口走过吗?这次被他欺了,以后样样都得被他欺。那埠头是公的,我们傅家桥人全有份!”“有份就要争,不能让他私占!”言谈之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平。在以后的挖井事件、两次抗税事件、以及最后华生被反动军队抓走的事件中,葛生嫂始终态度鲜明,坚决站在华生一边,对地主恶吏决不服软。当阿如老板去收税,把阿曼叔打死的时候,葛生嫂发疯似地抱了一个孩子,从屋内追了出来,一路大叫着:“天翻了!……天翻了!……救命呀……青天白日打死了人!……有皇法吗?”最后华生、阿波领导农民在祠堂里揭发阿如老板收租时打死人的罪行,傅青山乡长要葛生嫂证明阿如地主没有打死阿曼叔的时候,葛生嫂作为现场目击者勇敢地站

出来,大声痛斥乡长的卑鄙行为,其勇气十分可嘉。当年轻的华生和阿波没有识破乡长的阴谋,被乡长暗中勾结的军队抓走的时候,葛生嫂先是抱住华生的脚,呼唤苍天开眼,当华生被带走的时候,“她的火红的眼珠往外凸着,射着可怕的绿色的光。她一面撕着自己的头发和衣襟,一面狂叫着:‘老天爷没有眼睛!……祖宗没有眼睛!……烧掉祠堂!……烧掉牌位!……’”其反抗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在现代文学史上,像葛生嫂这样自始至终态度鲜明、反抗意识很强的女性形象很少,非常可贵。

总之,以鲁迅为首的乡土作家们,大胆揭露旧社会的妇女问题,通过塑造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探讨女性的悲剧命运及出路。同时也展示了女性内在的反抗意识从完全麻木、到产生微弱的萌动、到越来越强烈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一方面表明妇女要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奴化下走出来的艰难;另一方面也使广大读者看到了希望。当然这些女性反抗意识的萌生与否也与其性格、心理有关,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

参考文献

- [1] 乐黛云. 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 文学自由谈, 1991(3): 45-49.
- [2]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4-5.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Woman Characters in Local Novels of 1920s and 1930s

ZHOU Chun-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Lu Xun and other local Chinese writers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with their concern of the fate of women, they portrayed a large number of woman characters. Studies of these characters in the past are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lass oppression they suffered while neglecting the budding inner self-consciousness of resistance in these characters. In fact, these woman characters have some consciousness of resistance and behavior, not just the passively oppressed ones.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of the characters in perspective of 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

Keywords: Agrestic novels; female characters; consciousness of females

(责任编辑 张文鸯)